

别有用心，日方将“威胁论”披上童趣外衣

环球聚焦

□ 本报见习记者 黄荣潇 □ 本报记者 吴琼

据多家媒体报道，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概要已对外公布，内容通篇延续一贯论调，刻意炮制、反复炒作所谓周边“威胁论”，刻意制造地区对立氛围，暴露出加速扩军松绑的图谋。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自2021年起，日本防卫省持续发布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将其从政策文件包装成卡通绘本，以童趣为外衣将所谓“威胁论”渗透到校园之中。这一系列动作显示出极强的组织性和持续性，其目的是针对下一代有预谋的思想渗透。

精心构筑“童化”陷阱

日媒此前已经披露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据《朝日新闻》报道，新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据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为把相关内容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对外传播，本年度将首次制作精简短视频与简易宣传小册子。

然而，据多家媒体报道，自2021年起，日本防卫省已连续六年编制发布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在官方网络平台公开推送。去年更进一步，首次印制实体版本，向全国小学系统统一寄送。在日本右翼的精心构筑下，所谓“威胁论”披上漫画、插图、儿童读物的温和外衣，成为迷惑性和隐蔽性更强的陷阱，极易在心智尚未成熟的孩童心中埋下“外部有敌人”的思维预设。

以去年为例，据防卫省透露，儿童版白皮书共发放约6100册，覆盖全国约2400所小学。该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自卫队为什么是必要的”，强调“威慑力”对于防范战争而言“至关重要”，并以乌克兰危机为例，指出原因之一在于乌方“防卫力量不足”；第二部分阐述“日本周边正在发生什么”，列举了周边几个国家并阐述相关“军事风险”，解释称“日本所在的地区并不安全”；第三部分进一步阐述“日本该怎么做”，以表格和图片的形式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说明。其中指出“反击能力是增强防卫力的关键”，并列举了由此所需的导弹、设备、作战方式及费用等。

据悉，今年的《防卫白皮书》通过后，防卫省仍计划同步推出并发放儿童版白皮书，且相关内容仍延续往年基调：点名渲染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美化自卫队扩军、反击能力、内置自卫官招募二维码，向未成年人灌输对抗思维。

遭社会各界反对

在接受国会质询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辩称，制作并发布儿童版白皮书是为了“让肩负未来的年轻一代获得了解自卫队的机会”，但是该版白皮书自面世以来，遭到日本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对



2026年5月至7月，日本民众在东京、大阪等多地接连举行集会，呼吁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不断炒作所谓周边“威胁论”，刻意制造地区对立氛围。

和批评。

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围绕日本防卫省向各地小学分发的儿童版白皮书，教职员团体“全日本教职员组合”等组织曾与防卫省和文部科学省相关负责人当面对质。上述团体批评该手册不仅存在渲染对中国等特定国家危机感的内容，更实质上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涉嫌违反《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于1994年在日本获得批准，公约第38条第3款要求为尊重儿童权利提供“特别保护”，规定“缔约国应避免招募任何未满15岁的人加入武装部队”。

另外，众多教育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纷纷表明观点，认为“儿童版白皮书是最不合适的教材”，不应以单方面灌输的方式向儿童教授强化军事力量的国家政策。

日本历史学者藤原厚认为，向孩子们灌输邻国是“威胁”，会导致孩子们对这个国家产生偏见，削弱他们的求知欲和了解这个国家的兴趣。

“学校教育对学生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力，如果任由‘威胁论’在校园内持续渗透，将在年轻一代中助长好战、对外敌视的倾向。”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表示，这一趋势令人深感忧虑。

茶毒思想埋下隐患

日本近现代史学者石田隆至表示，由于历史原因，日本自卫队有其独特性，如果撇开侵略战争的责任不谈，就无法准确理解自卫队。但近年来的动向显示，日本政府正试图消除这些历史约束，而且这种趋势已蔓延至教育领域。“这份儿童版《防卫白皮书》淡化了历史背景，只让孩子们了解自卫队的‘积极’一面，这是破坏战后和平的行为。”

茶毒思想埋下隐患

回顾历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依靠长年累月的思想灌输与舆论造势，逐步裹挟全体日本民众登上战车，最终把整个国家推向火火的深渊。殷鉴不远，历

史的教训并未被真正吸取，反而披上童趣外衣持续向低龄儿童快速渗透，荼毒年轻一代的思想认知，为未来埋下了长期隐患。

有分析指出，渲染“外部威胁”是日本右翼政客屡试不爽的操作逻辑；只有不断放大外部危机叙事，扩军政策才能更容易获得民意支持；只有持续烘托地区紧张氛围，才能逐步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举动包装成“正常化”行为；只有让全社会长期笼罩在安全焦虑之中，一系列敏感且危险的政策调整，才能悄无声息地落地推进。

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执政党方面在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案中，还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以应对所谓“有事”局面，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长期追踪和批评日本军事扩张、日美军事一体化等问题的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在演讲中指出，当前高市政权的军事扩张政策不仅无助于提升地区安全，反而会使地区陷入“安全困境”。他表示，高市政权以及自民党等政党不断渲染邻国威胁，煽动敌对情绪，以此转移国内矛盾。这种将邻国塑造成“假想敌”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国内政治问题外部化，是一种错误路线。“日本作为曾经的战争加害国，给其他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而战争最终也使日本人自身沦为受害者，这正是历史留给日本的深刻教训。为避免重蹈覆辙，对当前社会上带有仇恨煽动性质的言论绝不能任其传播。”

沉溺于塑造假想敌的国家，终将被自己制造的安全焦虑所反噬。日本儿童需要的是怀抱和平信念、正视历史教训、以善意与理解展望地区共同未来。如果仍将所谓“威胁论”强加于孩子身上，未来的日本只会离真正的“正常国家”越来越远。

□ 本报记者 王艺茗

6月底，英国司法国务大臣萨拉·萨克曼接受天空新闻专访时抛出惊人论断：以当前案件审理效率测算，若不推行深层司法改革，想要清理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积压的刑事案件并使其恢复正常水平，至少需要300年时间。英国司法部同步发布最新统计，皇家刑事法院未结案件突破8万件，基层治安法院积压案件超37万件，司法拖延已经演变为系统性公共治理危机。一边是海量存量案件持续堆积，一边是法庭承载力、司法人力、传统审判机制全面承压，工党政府为此推出《法院与法庭法案》试图破局，却遭遇来自法律界、在野党的多重质疑。

积案规模触顶

300年清理周期的警示，背后是一组触目惊心的官方数据。直观勾勒出英国司法系统濒临过载的运行现状。截至2026年3月末，英格兰和威尔士皇家刑事法院在审积压案件达80061件，较2019年疫情前的3.8万件翻倍有余；基层治安法院积压案件370722件，同比涨幅11%，两类法院存量案件仍保持新增大于审结的失衡态势。

积压案件长期居高不下还暗藏更尖锐的民生痛点。全英刑事法院约6000起案件搁置超两年，其中2000起强奸、严重性侵犯案件受害者等待开庭时长突破一年。司法部调研显示，成年强奸类案件平均审理周期长达423天，超过一成性侵案件因受害者长期等待，心理崩溃主动撤诉，实质等于犯罪行为被免于追责。大量受害者在漫长等待中持续遭受精神创伤，部分受害者丢掉工作、社交隔离，长期焦虑、抑郁成为普遍现象。英国政府公开的受害者案例显示，一名家暴受害者2017年报案，案件搁置近十年仍未完成庭审，个人生活彻底被漫长司法流程摧毁。

审理效率持续走低则进一步增加积案数量，即便法院全年满负荷运转，单季度刑事法院仅能减少37件存量积案，改善幅度微乎其微。司法部预警，若维持现有机制不加改革，2028年皇家刑事法院积案总量将突破11.6万件，到2035年积案存量或将逼近20万，届时300年的清理周期还将继续拉长。

多重矛盾交织

有分析指出，财政长期紧缩、司法人才流失、审判机制僵化、案件复杂度飙升等结构性问题，是英国积案久治难消的根源。

令英国各界担忧的是，目前，长期财政削减已“掏空司法基础”，2009年至2022年，英国司法部门实际公共经费扣除通胀，人口增长后缩水30.4%，人均司法预算下降22.4%，法庭场地修缮、数字化升级、法律援助补贴资金长期短缺，大批老旧法庭设施失修关闭，可开庭天数持续受限。

此外，法律援助律师费十余年来未随通胀上调，刑事初级大律师时薪折损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近五年超四分之一刑事律师转行，40%青年法律从业者一年内离开诉讼、辩护岗位。律师大规模流失直接造成大量“无效庭审”，2024年皇家刑事法院出现7606

清案需二百年 英国司法改革举步维艰

场开庭延期，因辩护人缺席、证据筹备不足反复排期，进一步挤占审判资源，形成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传统陪审团审判机制难以适配现代案件需求。英国刑事司法长期赋予中等罪行被告人自主选择陪审团庭审的权利，陪审团审理流程繁琐，耗时是法官独审的1.2倍以上。当下数字犯罪、网络诈骗、群体性性侵犯案件激增，手机数据、云端存储、海量DNA证据大幅拉长庭前质证与庭审周期，单案证据量十年间增长十倍以上，传统审判模式承载力完全跟不上案件复杂程度的提升速度。

此外，行政协调机制失灵加剧流程内耗。警方取证、检方起诉、法庭排期、监狱押解各环节割裂，缺乏统一调度平台，被告人无法按时从监狱押解到庭，证据材料跨部门传递延误，庭审延期重复占用司法资源等问题常态化。同时，英国民事、家事法庭同步面临积案如山局面，小额诉讼平均等待50周，家事案件审理周期远超法定26周标准。全链条司法资源持续稀释，刑事法庭难以获得额外人力、场地补充。

多重矛盾层层叠加之下，短期堆砌法官、增加开庭天数等修补式措施杯水车薪。

制度调整艰难

面对300年清案周期的严峻预警，工党政府2025年底推出《法院与法庭法案》，提出系统性司法改革框架，核心思路是压缩陪审团适用范围，建立快速法官独审法庭，扩大治安法院量刑权限，通过简化审判流程提速增效。然而，改革方案一经公布，立刻遭到法律界、在野党、受害者群体三方拉扯，制度调整举步维艰。

本次改革核心举措包含三方面内容：设立独立“快速审判庭”，最高三年刑期的中等刑事案件取消陪审团，由法官单独审理，预计缩短20%审理时长；收回被告人自主选择皇家刑事法院陪审团庭审的权利，推动大量中间层级案件下沉至治安法院审理；扩大治安法院量刑上限，减少案件向上移送，分流皇家刑事法院审理压力。

但改革方案遭遇强烈反对。英国大律师协会指出，大规模取消陪审团审判违背英国数百年的司法传统，大量案件改为法官独审容易引发权力失衡、错判风险上升；性侵案件受害者团体则担忧，无陪审团庭审可能弱化对暴力犯罪的震慑，无法充分还原案件细节，损害受害者权益；保守党直接批评改革治标不治本，回避了十余年来司法预算长期削减的问题，并认为单纯压缩审判程序，牺牲司法公正换取审理速度属于本末倒置。

与此同时，改革配套短板尚未补齐。即便法案顺利通过，司法人才缺口、法庭场地不足、数字化建设滞后等问题仍无完整解决方案。短期之内，英国司法体系很难同步实现经费扩容、人才回流、流程简化多重目标。司法国务大臣坦言，即便改革顺利落地，积压案件完全消化仍需10年至20年，若法案受阻，300年的悲观预判或将成为现实。

有分析指出，这场司法改革博弈的走向，不仅将决定数十万积压案件当事人何时迎来正义，更将深刻影响英国现代司法体系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根基。



2026年以来，英国司法国务大臣萨拉·萨克曼(右一)在多个场合谈及案件积压问题的严重性并呼吁进行司法改革。

CFP供图

低龄恶性犯罪高发 社会改革呼声高涨 韩国计划有条件下调重罪刑责年龄

□ 本报记者 王婉娟

近日，韩国法务部与性别平等家庭部计划修订沿用73年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针对杀人、性侵等重大恶性犯罪，有条件将刑事责任追责门槛下调至13周岁。此次政策调整，源于韩国低龄恶性犯罪频发、社会改革呼声高涨等现实情况。与此同时，修法提案引发全社会激烈争议，各界围绕惩戒力度与未成年人保护的平衡展开深度辩论，也集中暴露了低龄犯罪治理面临的困境与难题。

实行重罪差异化追责

韩联社6月28日报道，韩国法务部与性别平等家庭部已就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修订达成折中方案，拟对已施行73年的刑法相关条款作出重大调整。此次修法的核心是打破原有14周岁的统一刑责底线，对杀人、抢劫、重大性侵、群体性暴力等恶性重罪，有条件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3周岁。若该法案最终落地，将成为韩国70余年来未成年人司法领域的一次关键性制度革新。

根据目前披露的修订方案，本次调整并非全面放宽未成年人刑事追责标准，而是秉持“重罪从严、轻罪从宽”的差异化治理原则，精准划定追责边界，细化处置标准，兼顾司法公正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体包含三大核心规则：其一，限定适用罪名，刑责年龄下调仅针对谋杀、抢劫、重大性侵、团伙暴力等性质恶劣、危害严重的重罪；其二，增设惯犯惩戒机制，未成年人若三次及以上被送入少年院矫治，将丧失刑事豁免资格，不再受原有年龄免责标准限制；其三，坚守轻罪保护原则，对于13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普通非暴力轻微犯罪，依旧以教育矫治、保护性处置为主，不适用监禁等严厉刑罚。

韩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确立于1953年，14周岁的追责底线已沿用70余年。按照旧法规定，10至14周岁的违法青少年被定义为“触法少年”，无论涉案情节轻重，均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仅接受社会辅导、矫治教育等保护性措施。本次拟议修订，将针对性填补低龄重大恶性犯罪的司法追责空白，破解长期以来“重罪免罚”的制度短板。

低龄恶性犯罪高发 社会改革呼声高涨 韩国计划有条件下调重罪刑责年龄

据韩国媒体消息，该提案原定于6月30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目前审议日程已暂缓。韩国性别平等家庭部表示，法案上报国务会议的时间表尚未最终敲定，政府内部需开展多轮闭门磋商，进一步细化条款、优化细节。

低龄恶性犯罪持续攀升

此次刑责年龄修订提案的推出，是韩国低龄犯罪形势恶化、社会民意倒逼、传统矫治体系失效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当前韩国未成年入犯罪呈现出鲜明的反常特征：未成年人口持续递减，但犯罪案件总量逐年攀升，且作案手段愈发恶劣，恶性案件占比持续上升，传统以保护教育为主的少年司法制度，已难以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

官方统计数据印证了韩国少年犯罪治理的严峻形势。据韩国政府及国会统计数据，警方查处的未成年人涉案人数涨幅超八成，盗窃、人身伤害、性暴力等案件数量大幅攀升，仅抢劫、谋杀案件略有回落。韩国法院《法院统计月报》显示，近十年韩国青少年保护类案件总量增幅超五成，2025年相关案件达51360起，其中未达原刑事责任年龄的低龄涉罪案件多达22598起，且占比仍在快速扩大，低龄化、恶性化犯罪趋势愈发凸显。

今年3月，韩国民调机构盖洛普面向1002名成年民众开展专项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支持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韩国教师联合会针对全国8900名教师的线上调研进一步显示，96.4%的一线教师赞同修法，社会各界改革共识广泛凝聚。

与此同时，原有少年矫治体系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倒逼制度革新。韩国警察大学行政学系教授韩民京指出，部分低龄罪犯主观恶念极强，作案手段恶劣，危害性远超普通成年犯罪，但现有矫治体系既缺乏刚性惩戒力度，也缺少专业化的心理干预与矫正重塑，导致保护处分流于形式，无法从根源遏制再犯风险。东国大学警察与刑事司法学院名誉教授李允浩也表示，少年司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少年院收容过载，人满为患。过度密集的收容管理，不仅无法实现教化改造的初衷，反而让矫治机构沦为低龄罪犯交流、效仿犯罪手段的不良场所，加剧恶性

循环。

司法平衡难题亟待破解

作为韩国70余年来首次重大的涉及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调整，本次刑责年龄下调提案引发全社会广泛热议。司法界、学术界、人权机构及普通民众立场分化，围绕未成年人犯罪“惩戒与保护如何平衡”展开激烈辩论，暴露出全球低龄犯罪治理的共性难题。

政策支持者以维护公共安全、坚守司法公平为核心依据，坚定支持修法。多数民众、一线司法工作者及部分法学家认为，13周岁青少年已具备基本的非辨别能力与行为认知水平，能够清晰认知杀人、抢劫、性侵等重罪的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有条件下调重罪刑责年龄，能够补齐司法制度短板，强化法律震慑力，有效遏制低龄恶性犯罪高发态势，兼顾社会公共安全与司法公平正义。

反对者则表示，13周岁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心智可塑性强，偏差行为多受家庭、校园、社会环境影响，相较于严苛的刑罚惩戒，源头性的教育矫治、心理干预、环境整治才是治理低龄犯罪的根本路径。低龄未成年人纳入刑事追责体系，容易使其背负罪犯标签，陷入身份固化困境，彻底丧失改过自新的机会，反而提升再犯罪概率，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社会长治久安。

韩联社、《首尔经济日报》等主流媒体则聚焦政策落地实效，呼吁政府摒弃“重立法、轻配套”的治理模式，同步加大财政投入，搭建专业化少年法庭，升级少年矫治机构硬件设施与专业人员配置，完善配套矫治体系，避免新法流于纸面，难以落地。

此次修法争议，折射出现代社会低龄犯罪治理的普遍困境：单纯下调刑责年龄，强化事后惩戒，仅能起到短期震慑作用，无法从根源消除低龄犯罪乱象。韩国各界普遍认为，即便该法案顺利落地，也需同步完善前置化、源头化治理体系，健全家庭监护干预、校园法治教育、问题少年心理矫治、社会帮扶救助等配套机制，持续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压实各方监护责任，强化法治价值引导，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低龄恶性犯罪高发难题，实现惩治犯罪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双向平衡。

立法动态

美国众议院通过儿童网络安全相关法案

当地时间6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67票赞成、11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儿童互联网和数字安全法案》。法案要求企业为儿童提供限制成瘾功能的方法，并制定相关政策，以保护儿童免受包括性剥削在内的一些伤害。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洛丽·特拉

汉表示，许多家庭的孩子因为网络安全问题自残甚至结束生命，而硅谷的高管们只关心股价而非孩子们的安全。她强调，此次通过的这项法案，强制网络平台默认启用安全措施，让众多科技公司为其网络平台上所允许的最严重危害承担责任。

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6月26日表决通过新版《防卫省设置法》等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增设防卫副大臣等。有专家学者指出，这标志着高市早苗政府在军事扩张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其扩张野心暴露无遗。据悉，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正式

成立，届时将新设由航空自卫队高级官员指挥的“宇宙作战集团”作为专职太空部队，推进卫星发射、太空态势感知及监视能力建设。新版《防卫省设置法》还包括将防卫副大臣增至2名，扩大退役自卫官再就业帮扶范围，提高退役自卫队员补助金发放标准等内容。

尼参议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设立州警

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参议院近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各州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队，此举旨在应对恐怖主义、匪帮活动等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据尼日利亚《先锋报》等媒体报道，参议院在全体会议上逐条审议该法案，超过三分之二参议员投票赞成。法案核心内容包括：允许36个州及联邦首都区建立警察

系统，与联邦警察并行运作。州长有权任命州警察专员，并就公共安全事务发布指令。法案另一个重点是防止各州滥用警察权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巴米德勒勒强调，法案包含联邦监督、任命立法确认、高级官员罢免程序、定期审查等保障措施，防止州长将州警用于政治目的。（本报记者 吴琼 整理）